

西方“媒介哲学”评价

2005-11-28

作者： 芮必峰

关键词： 媒介哲学 | 阅读：690次 |

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或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一些港台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本文拟对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出版以来，直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是美国）的“媒介哲学”理论作出评价。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关于“媒介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看来，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1]为此，他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一次对“媒介哲学”作出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专著是20世纪出版的。1956年，弗雷德·赛伯特（Fred Siebert）、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以下简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2]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最为古老，“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3]“从历史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4]“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5]自由主义理论是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四种理论》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弥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6]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它的理论大前提是：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时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7]“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8]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被《四种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就像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样。这种理论体系下的报刊和传统集权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报刊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不同的是它们“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的自由概念”。[9]“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10]

为叙述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在对《四种理论》一书的有关情况大致介绍后，以表格的形式对这四种理论的哲学根据和重要主张作一个比较性介绍，表一反映各种理论的哲学依据、表二反映它们的重要主张。

表1.《报刊的四种理论》哲学根据比照表

哲学根据/ 理论名称	集权主义	自由主义	社会责任理论	苏联共产主义
人的本性	邪恶，残忍，自私自利。	善良、仁慈、人是理性动物，具有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动物，人性善恶参半，并颇为自私。	人先天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培养和教育。
社会（国家）的本质	社会（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是实体的存在，有着特定的目的。它的权力是通过一种还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的过程推论出来的，是至高无上的。	社会（国家）只不过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其每个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除此之外无任何目的。	社会（国家）是个人的组合，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全人类的发展。	社会（国家）是一个实体，有着特定的目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阶级彻底消灭后，国家也会自动消亡。
个人与社会	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不能独立存在；社会比个人重要。	个人是独立的实体，其重要性超过社会（国家）。	虽然个人是独立的实体，有独立的意志和目的，但社会（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下一篇 NEXT

MORE >>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 2006-05-29

一、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动态 NEWS

MORE >>

-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会的关系	人重要，个人目标必须服从社会目标	家）社会（国家）只是个人实现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益代表着整体或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应高于个人利益。	益；有时还应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社会利益。
知识与真理的性质	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知识和真理要通过智慧来发现，只有“聪明人”（统治者）才能发现知识和真理	人类天赋智慧平等、每个人都有学习知识的能力；真理就在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发现它，因此，真理愈辩愈明。	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知识需要努力学习；真理需要普及教育，并由优秀而负责任的媒介去发现并传播。	人类智慧系后天教育培养出的结果；知识和真理需要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去普及并传播。

《四种理论》出版40年来，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11]

就我个人看，该书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的作者们坚持认为：“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12]因此，在考察各种报刊体系和报刊活动时，他们自觉地将这些体系和活动放入不同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进行，并努力探寻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真正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次，作者们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作了哲学根源上的探索。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色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哲学”。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

第四，被美国和许多西方人津津乐道的“社会责任论”，事实上是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后才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一理论不曾也不打算动摇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但它将自由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部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也有启发作用。

但是，《四种理论》毕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正如有学者已经批评的，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模式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是一种静止的僵化模式；“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报刊体系。正因为如此，一些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媒介哲学”模式。

二、朗温斯坦模式和梅里尔的“政治—报刊圈”：表2、〈报刊的四种理论〉重要观点比照表

哲学根据/理论名称	集权主义	自由主义	社会责任论	苏联共产主义
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	独裁的统治者；经政府特许的个人	资本家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刊从业人员。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
报刊的所有权	政府；政府特许的个人	资本家	资本家；政府；社会团体。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
报刊的目的	统一思想，消灭反对意见；保持现状，巩固政权。	建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第四等级”。	建立“意见的自由市场”；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富人的自由。	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的发展
报刊的功能	传播统治者认定的“真理”；传达政令。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务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务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促进经济发展；提供高尚的娱乐。	充当集体的宣传着、鼓动者和组织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管理方法	特许出版制；新闻检查；煽动诽谤罪；“知识税”及津贴报纸；政府发行官报；贿赂记者以控制舆论。	极端个人主义；完全放任自由竞争；反对任何干涉。	实行报业专业化；成立报业评议会；政府发行报纸；政府制定法规，以保障新闻自由；提倡新闻自律。	。报纸由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出版发行，各级党委宣传部负责管理同级报刊；上级对下级报刊实行批评监督。

资料来源：两表均根据〈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基本观点编制

1971年，拉尔夫·朗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与约翰·梅里尔（Join Merrill）合著了《媒介、讯息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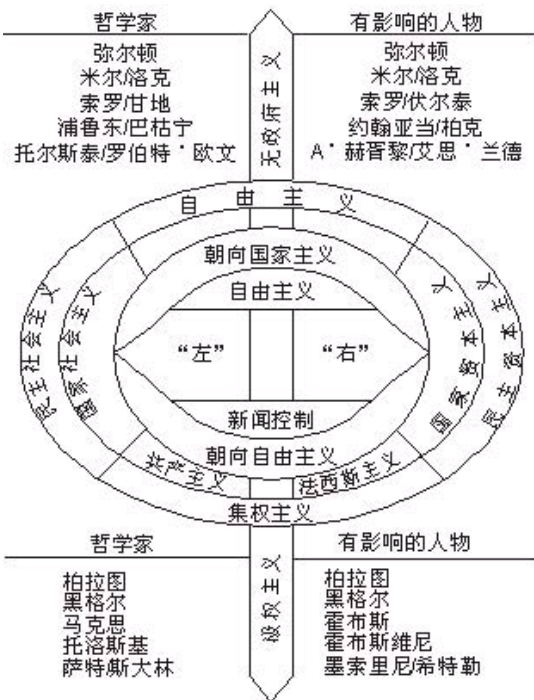
(Media, Messages and Men). 朗温斯坦在书中批评“四种理论”模式“僵化”，“不能适用于各种报刊体系”，并提出一种与所有制形式及其哲学相关联的“双层理论”（two-tiered approach）。他认为，报刊所有制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私人所有，靠广告和订阅费维持；二是政党所有，靠党费来津贴；三是政府所有，由国家拨款或营业费资助。关于报刊哲学，朗氏保留了“四种理论”中的“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观点，但把“苏联共产主义”改成了“社会集中主义”（social centralist）。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在西方人眼里本身就带有否定的价值色彩，应舍去；“社会集中主义”中的“社会”反映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社会优于个人的精神，“集中主义”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中所包含的报刊是集体的核心领导的本意。“社会责任论”被朗氏改成“社会自由主义”，以消除原概念与其内涵之间的模糊色彩，并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这一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

表3、朗温斯坦模式

报刊所有权
1、私人：个人或组织法人拥有，主要靠广告或订阅维持。
2、政党：各竞争党派所有，有党的组织或成员提供帮助。
3、政府：政府或执政党所有，主要靠政府拨款或收受营业执照费资助。
报刊哲学
1、集权主义：政府压制批评、并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实行特许制和检查制。
2、社会集权主义：政府和执政党控制报刊，报刊归政府和执政党所有，目的是实现其经济和哲学的目标。
3、自由主义：为保证意见自由市场和自主过程的运行实施，政府不加控制（法律规定的有限的诽谤、侮辱罪除外）。
4、社会自由主义：为保证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和自由主义精神的贯彻，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干预。
5、社会集中主义：为保证自由主义精神的贯彻执行，政府或公众掌握部分传播渠道（将部分媒介归为政府或公共所有）。

资料来源：John C. Merrill and Ralph L. Lowenstein, Media, Messages, and Men, New York: Longman, 1979, P. 164

1979年，当《媒介、讯息、人》再版时，朗温斯坦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模式（见表3），在重新修订的模式里，“社会集中主义”成了现在的“社会集权主义”（social authoritarian），其目的无非是想强调这种报刊思想与传统集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新模式中的“社会集中主义”被解释为与先前那个同样术语不同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集中主义”要求媒介部分地归国家或公众掌握，并认为这是保障自由主义精神全面贯彻的必要条件。1990年，朗温斯坦在自己的另一部新著中对这个模式作了较全面的解释，个别地方还作了改动，但总体框架和思想都没有变。[13]



朗温斯坦的合作者，约翰·梅里尔教授首先对上述模式作出评价。1974年，梅里尔出版《自由的律令》（The Imperative of Freedom）一书，书中认为，朗温斯坦模式比“四种模式”“更成熟、更符合实际”；同时，他指出了该模式的两大缺陷。第一，梅里尔认为，朗氏的“社会自由主义”概念本身是矛盾的，因为“社会的”包含着“集体”

集中”“指令”等意思，一个个哲学概念不能同时表述自由和集中两层意思。第二，在梅里尔看来，朗温斯坦模式和“四种理论”模式一样，都是把集权主义作为一极而把自由主义作为另一极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在这种体系里，各种理论成了一个个被人为隔开的笼子。梅里尔称这种方法为“鸽笼式”的建构方法，提出“它实际上假定各种媒介体系间相互排斥、彼此独立”，显得有些僵化。为此，梅氏在书中提出一个“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 circle），这是一种将自由主义置于一个闭合圆圈的上端，而将集权主义置于下端的动态模式（见图1）。

在该模式中，“四种理论”实际上被弱化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趋势和自由主义趋势。它们在观念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彼此经由“国家主义”而相通的路径：从自由主义方面看，朝“左”，通往社会主义，向“右”则通往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相反。

三. 哈切登的“五种理论”模式：

从严格意义上说，朗温斯坦模式也好，梅里尔的“政治—报刊圈”也罢，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塞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真正对“报刊四种理论”作出重大改造的人应首推威廉哈切登（william hachten）。1981年，哈切登在其著作《世界新闻面面观》（The world news prism）中首次提出他自己的报刊五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四种理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opment）理论（见表4）

类型	控制	政策	实例
集权主义	相对国家而言，公众和个人都是次要的。	媒介的运作以不批评政府，不持反对意见为前提；隐蔽的或公开的检查制度。	几个世纪前的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现代专制国家。
西方理论（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	报刊的私人所有；私人 and 公共广播系统。	强调或突出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但也重视履行道德和法律责任。	美国、英国、西欧、日本。
共产主义	共产党和政府掌握媒介，不允许私人拥有。	强调官方观点和政策的传播，动员并要求媒介支持国家的发展进步。	9前0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古巴、中国。
革命理论	非法或带有颠覆性质的媒介；不受政府控制。	地下媒介，常出自境外国外；企图推翻政府。	战时沦陷区地下媒介；非洲、印度部分地区的殖民报刊。
发展理论	所有媒介受政府（或）执政党控制，接受其领导	要求媒介为国家发展目标服务；政策一体化；开展反贫穷，除疾病，扫文盲运动	第三世界的非工业化年、非共产党国家。

资料来源：根据威廉哈切登《世界新闻面面观》（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编制。

哈切登认为，亚当斯和托马斯潘恩是美国历史上革命新闻工作代表；而1912年发行的《真理报》则是“革命理论的很好范例”，当时，列宁提出利用合法报纸来履行革命组织的使命。哈切登把霍梅尼的支持者利用广播、图片所从事的推翻伊朗国王的活动，作为当代革命理论的事例。

“发展理论”在哈切登看来，是集权主义的变化形式，它强调大众传播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发展新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应动员大众传播外发展经济、扫除文盲和政治教育服务；媒介必须维护政权，否则就会妨碍国家建设。出于同样的理由，国外记者在驻地国采写和发布新闻也必须服从该国权利机构的管辖。发展理论认为，既然信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它就必须用来推动整个国家的事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事业来说，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必然是相对次要的。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哈切登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合而为一。这样做不独为了简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指出两种理论根本上的一致性。即它们在一些基本哲学思想或理论前提上，在价值观念上，甚至在基本所有制形式上都没有本质性差别。一句话，“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时期新的发展，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反对面。把两者喝而为一合乎逻辑，也符合实际。哈切登做的第二个工作是增加了两种理论。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意义。报刊的“革命理论”尽管适用面不那么广泛，但它毕竟是历史和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传播体系，有时这种传播体系的实际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它在一个企图完整反映各种媒介体系的模式中，理应有一席之地。关于“发展新闻学”，则是站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在新闻学领域的反映。它的外延比较光、广，内涵则有些模糊，其中包含的思想错综复杂。但起影响广泛，而且显示出较强生命力。应该说，哈切登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但却是很意义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切登模式的知道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塞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朗

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真正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并独树一帜的理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批判学派理论。该学派初兴于欧洲大陆，逐步传入美国，并产生一系列影响。

四、J赫伯特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

J赫伯特阿特修尔（J Herbert Altschul）是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阿特修尔出版了自己积30年心血写成的《权利的媒介》（Adgents of Power）“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较大反响，迄今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报刊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等等。”[14]阿特修尔在《权利的媒介》中“对新闻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场”。“他首先向被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新闻自由开刀。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

[15]正因为作者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与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不同，他所构筑的“媒介哲学”模式也与其他一些模式迥异。阿特修尔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新闻媒介体系后，形象地把它们比作一部有不同主题、旋律和变奏的交响乐，进而把这部交响乐划分为三个乐章，“没每一乐章包含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基本主题中又有不少变奏”。

[16]在对各个乐章命名时，作者似乎颇费踌躇，他不愿简单地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这样的数字来命名，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恰好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命名相吻合。他更不愿意用一些评价性的术语（如先前介绍的几位学者用过的那些）来给这三个乐章命名。他认为，这些术语既牵强附会，又容易妨碍正确理解。最后作者运用了“多少加以修饰过的经济状况划分三个乐章”，并将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见表5）。随后，作者仍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当我们采用这些专门术语的时候，是完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乐章中各种旋律变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能够弥补这一缺陷。”[17]阿特修尔的“市场经济世界”大致上指的是发达或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是指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国家；“进步中世界”则大致等同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

表5、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

观点/名称	市场经济世界	马克思主义世界	进步中世界
关于新闻事业的目的	追求真理	寻求真理	服务真理
	尽社会责任	尽社会责任	尽社会责任
	以非政治方式进行告知（或教育）	（以政治方式）教育并争取盟友	（以政治方式）进行教育
	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并拥护资本主义学说	通过要求拥护社会制度学说而人民服务	通过寻求与政府合作人民服务，为各种有益的目的进行变革
	作为昨日监督政府的工具	统一观点，改变行为	作为争取和平的工具
关于新闻事业的信条	新闻媒体不受外界干涉	新闻媒体有改变错误的意识，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段觉悟	新闻媒体是一支取合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坏力理
	新闻媒体为人民的知晓权服务	新闻媒体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	新闻媒体是有益于社会变革的工具
	新闻媒介力求获得真理并反映直理	新闻媒介满足进实际变革	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开的工具
	新闻媒介公开，客观地进行报道	新闻媒介促进实际变革	新闻媒介是旨在用来沟通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关于新闻自由的不同观点	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记者不受外界控制	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人民的意见得以发表，不仅仅是富者的意见	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的心灵自由
	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介不屈从于权力，不受权力操纵	新闻自由必须反对压迫	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次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新闻自由不需要国家新闻政策保证	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以保证新闻自由采取正确的形式	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来对自由提供合法保障

资料来源：根据J·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利的媒介》（中译本）第十一章3份表格综合，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324页、332页。

阿特修尔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考察了以上三种媒介的体系，还从不同的价值观或信仰考察了生活在三种不同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真诚而热烈地信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至于不去对那些理论作理智的思考

和分析。例如，市场经济世界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坚信，新闻媒介的任务是超脱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报道消息。然而，阿特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这点而论，市场经济旋律的维护者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无论如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脱政治。”[18]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则认定报纸是教育工具，只有坚持马列主义观点才能有助于读者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阿特修尔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为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所津津乐道的观点，那就是报纸是记者和读者之间双向交流或“对话”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世界，新闻工作者信息公众有知晓权，但却不去理会读者向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想知道什么权力，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报纸可以通过读者来信与群众沟通，为人民服务。总之，阿特修尔认为：“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19]

阿特修尔的分类不一定是科学的分类，阿特修尔模式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模式，但它确实对由《报刊的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同时，阿特修尔还通过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及较严密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新闻工作者一些天真观点，这些新闻的工作者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世界，自由地追求真理，而别的世界新闻工作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五、罗伯特·毕加德的综合模式

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说它带有综合性质，是因为该模式保留了塞伯特—彼得森—施拉姆、姆模式的全部四种理论以及哈切登“五种理论”中的“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同时，毕加德还吸收了哈切登把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归纳在“西方理论”中的做法。毕加德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cy socialist）理论。这个世纪中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概念在毕加德模式中，实际上成了报刊的“第七种理论”。毕加德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一样，要求媒介有多种声音，发表不同意见，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或一部分人意见，目的是保护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力，推进全社会民主发展。为了保证媒介做到这一点，国家可以介入媒介经济或所有权，但这种介入只是手段。毕加德还认为：“最终，这种体系下的媒介所有权将通过基金会、非盈利性社团、新闻从业人员联合会和其他集体组织归公所有，并不以营利为目的。”[20]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理论与自由主义，甚至社会责任理论的不同之处。为了把这种理论与传统理论根本区别开，毕加德进一步写道：“在民族社会理论中，媒介被视为人民的工具，是公用事业；人民的呼声、愿望，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表扬和批评，都可以通过它得以广泛传播。”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媒介的运行是为了公民的需要，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21]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为毕加德模式增加了新意，但也给该模式带来了一些麻烦。毕加德在自己的综合模式里（见图2），把这个新加的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一并归入“西方”名下；与此同时，他又将这个概念与“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起置于“平衡或不确定”栏中，并与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如果说毕加德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阐述还基本清楚的话，那么他在模式中的这种安排则不能不说有些令人费解。在我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另外两重传统理论一起成为“西方理论”，主要不是由于它产生于西方国家，而在于这一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根本联系；即如此，就很难说它在“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极间起“平衡”作用或具有“不确定”性。反之，如果抽去“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给它以新的内涵，那么，就不能在把这一概念与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一样归入“西方理论”。

集权主义倾向		平衡或不确定 义倾向			自由主义		
集权主义	共产主义	革命理论	发展理论	西方			
				民主社会主义（毕加德）	社会责任论	自由主义	
赛伯特-彼得森-施拉姆	赛伯特-彼得森-施拉姆	哈切登	哈切登	产生于20世纪的西欧，源于与典自由主义哲学相绪合的马克思主义，旨在提供多种渠管，使各种意见都能公开发表，以便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进民主建设，使所有公民具有享有媒介受集体管理部门和法律控制，禁止法干涉私人权力和其他为法律认可的社会利益，媒介归公众团体，非营利机构以及（在这时的）私人实体所有，与别的理论不同，媒介决不受政府，经济或社会利益的非法控。制）	赛伯特-彼得森-施拉姆	赛伯特-彼得森-施拉姆	

图2、毕加德的综合模式根据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改编

对毕加德模式中存在的上述逻辑矛盾，有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修改方法。第一，删掉模式中“集权主义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和“平衡或不确定”三项分类内容，代之以两条方向相反的平行线：向左，趋向“集权主义”；向右，趋向

“自由主义”。这种修改方法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联系，从而使这一理论可以逻辑地归于“西方”名下。此外，它也部分克服了原模式的静止性和僵化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灵活性。第二，也可以考虑略去“西方”标题，使“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恢复到与另外四种理论同一层面。显然，这种改动意味着不去过多地考虑“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但它起码在形式上克服了原模式存在的逻辑矛盾。最后，还可以干脆不考虑“民主社会主义”固有的哲学根源，把它提一格，使之处于同“发展理论”、“革命理论”相同的层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确实也不失为一种调和矛盾的方法。

尽管毕加德模式存在一些编制上或逻辑上的瑕疵，但毕氏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为“媒介哲学”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从世界范围看，确实还存在一些其他各种理论都难以概括的报刊体系。如瑞典，尽管“下新闻足以理论在瑞典社会中倍受推崇”，但为帮助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报度过经济难关生存下来，从而保证新闻媒介的多样化。“政府有选择地直接资助新闻媒介的政策已成为瑞典新闻管理体制中独具特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22]还有前南斯拉夫的新闻事业，据说它“既不同于西方，又相异于东方，既不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又相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既不是所谓权力结构中的第四阶层，又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23]我们很难说毕加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上述两种媒介体系或她们当中的某一种体系，但在我们介绍过的各种理论当中，还找不出一一种更接近的理论来描述这两种报刊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加德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5页。

[2] 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2页。

[3] 同[2]，9页。

[4] 同[2]，8-9页。

[5] 同[2]，7页。

[6] 同[2]，85页。

[7] 同[2]，7页。

[8] 同[2]，6页。

[9] 同[2]，7页。

[10] 同[2]，7页。

[11] John C. Merrill, *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 Toward a Responsible Use of Press Freedo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7-98;

[12] 同[2]，1-2页。

[13] 参阅 Ralph Lowenstein and John Macromedia: *Mission, Message, and Morality*.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1990.

[14] 见林珊为《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写的“序”。

[15] 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39页。

[16] 同[15]，315页。

[17] 同[15]，316页。

[18] 同[15]，321页。

[19] 同[15]，337页。

[20] Robert G. Picard, *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p. 67.

[21] 同[20]，70页。

[22] 魏言：《政府干预与报业竞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

[23] 居延安：《可供思考和研究的材料》，载《新闻大学》，第12期（1986）。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 8134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不能超过250字, 需审核后才会公布,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